

绪 论

国家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依着经济运行和政治时局的动荡而波动的古老的历史范畴。几千年来，人们对国家财政或褒或贬，但它始终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从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家财政的运行有时会带来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时也成为朝代更迭的导火索、人民灾难的渊藪、社会发展的障碍。实践证明 国家财政是任何政权组织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同时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是国家强弱乃至兴亡的催化剂，是国民经济发展或衰落的重要经济杠杆 正如马克思所说：“赋税是国家的经济基础 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列宁也说：“任何社会制度 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 对此，我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也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班固在他所著的《汉书·食货志》中说：“财者 帝王之所以聚人守位 奉天顺德 治国安民之本也。”南宋史学家郑樵说：“古之有天下者 必有赋税之用”。《金史·食货志》中说 国非食货不立。明朝宋濂在他所著的《元史·食货志》中指出 国无食货则无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18～2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

《列宁选集》第 4 卷，68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郑樵：《通志》卷六一《食货一》。

为国。此类论述 不绝于史。凡此都说明国家财政对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财政的历史渊远流长，唐尧虞舜之时已见端倪，禹夏殷周之后日渐发展和完善，直到新中国建立，中国财政发展史已经成为一门系统完整的科学——中国财政史学。中国财政史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军事史等专业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是以中国财政历史史实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资料和历史文化遗存为研究依据，分析和研究中国财政这种分配活动及其所体现的分配关系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它对社会经济政治的作用和影响的一门专业历史科学。

众所周知，自国家产生以来，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和阶段。在这五种社会形态和阶段中，国家财政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

在奴隶社会，财政成为奴隶主贵族维持其宗法统治的工具，当然，在客观上，也成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催化剂，促成了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财政政策和制度等，也有了长足发展。

在封建社会，财政不仅是地主阶级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手段，是统治阶级腐化堕落的经济根源；而且是制约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进步的经济杠杆。这期间的财政政策、策略、制度 财政收支的种类、方法、手段 财政管理机构的设置、财政法规的建设 以及财政思想等等 都更加发展、更加完善，并以其方法之科学而著称于世，以其思维之缜密而独领风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的重压下，中国人民受尽凌辱，饱经忧患。这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掠夺中国人民的得力工具，是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经济武器，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终于在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由孙中山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遂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1921 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建立了广州革命政府，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又叛变了革命，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第一次大革命惨遭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建立，一度点燃了人们希望的火花，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人们的希望又化为泡影。直到 1927 年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中国人民才熬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黎明，并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时期的中国财政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质，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在广州、武汉建立的革命政府，虽有新旧之别，但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时的财政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斗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支柱。尽管当时的财政制度还很不完善，财力也很有限，但财政的性质无疑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袁世凯及其后继者所建立的北京政府，则完全是地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在中国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苟延残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反动政府。这个时期的财政，同清后期的财政性质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搜刮中国人民膏脂、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工具，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蒋介石所建立的南京政府，虽然也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但实质上还是由帝国主义支持、以大地主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反共

反人民的反动政府，只不过在中国人民头上又加上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座大山。这时的财政不仅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工具，而且成为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济来源，成为蒋介石政府围剿工农红军和一切进步力量的经济手段。只是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政府投入了一部分财力从事抗日活动和进行对日作战，这时的财政具有些许民族性，但其财政总体上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质是勿庸讳言的。1927年以后，由共产党人建立的工农民主政府，是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立的革命政府，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深得人民大众拥护和支持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个政权的财政虽然十分拮据，但却成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经济保证，同时还为新中国财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造就了一大批出色的财政管理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是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率领全国人民正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政结束了几千年来财政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的历史，成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人民谋福利的新型财政。新中国建立以来，财政这一经济杠杆对筹集大规模经济建设资金，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进行和平建设；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等，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通过上面的扼要叙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财政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它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前进足迹的记录；也是人类文明的见证，是全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有人以为中国财政史固然内容丰富 绚丽多彩 但这些内容距离现实已经十分遥远，况且社会形态几经变换，昔日的财政政策、措施、制度等等都早已藏进历史博物馆 对于今天还有研究价值吗 我们认为 不仅有价值 而且是必须的。

很早以前 毛泽东就谆谆告诫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 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这就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没有继承 就没有发展 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所以 研究中国财政史既有历史意义 也有现实意义。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就是要挖掘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财政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一代人 有义务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宝藏挖掘整理出来 以遗后人 否则我们将上负祖先，下负来者。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就是要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现代财政。目前 我国正在为完成“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而深入进行经济改革，以期早日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在这场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大潮中 我们不能不讲究理财之方。例如 如何才能生财有道、聚财有度、用财合理 如何促进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的优化组合和合理调整？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体系？凡此种种 都要求我们加强对我国财政现状的调查 加强对我国财政理论的研究，使国家财政在我国经济改革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然而 我国财政的现状是我国财政历史的发展和延续 研究我国财政的现状 不能不研究我国财政的历史 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52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6。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801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会主义财政体系，也不能不研究中国财政的发展史，以便知古鉴今，把握未来。中国财政史是研究新中国财政的基础和前提，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的重要历史依据。且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尽管历史上的许多规章、制度、措施、政策等等，已经不适当今时代，但我们祖先的遗传因子已经和正在自觉不自觉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们应该通过对中国财政史的研究更自觉地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扬弃，有批判地吸收，以不断充实、发展、完善现代财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此外，中国财政史同政治史、经济史一样，充满了进步与腐朽的撞击，充满了光明与黑暗的拼搏，充满了前进与倒退的较量，充满了革命与反动的抗争。它往往让我们掩卷长思，也往往让我们拊掌太息；有时令我们义愤填膺，有时也令我们额手称庆，从而使人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使我们进一步树立爱国主义情操，也使我们进一步提高民族自信心；还能使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理论的正确性，增强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显然，中国财政史不仅是一门专业历史课，而且是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题材。

当然，我们研究中国财政史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不能食古不化、生吞活剥、兼收并蓄，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进行扬弃，批判地吸收，真正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唐朝魏征在同太宗李世民讨论国政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由此我们可以明了研究中国财政史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

使我们在进一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免蹈历史的复辙。知古而不泥古，以古鉴今，才是我们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正确态度。

由于研究和学习中国财政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在国家教委颁发的专业目录中将中国财政史作为财政学专业的专业主要专业课之一；财政部人教司不仅重视中国财政史这门课程，而且对这门课程的教材建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早在 1979 年财政部教育司就组成专门写作班子，历时八年，于 1987 年编写并出版了《中国财政史》教材和 12 辑 620 多万字的参考资料，这为中国财政史的教学、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大大推动了中国财政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95 年财政部培训中心再一次组织人员重新修订《中国财政史》教材，本教材就是在培训中心组织支持下重新修订编写的，这充分显示了财政部对中国财政史科学的关心与重视。

当这本《中国财政史》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 1987 年版《中国财政史》及其参考资料的组织者和编写者们。当时“七校八老”为编写《中国财政史》和《中国财政史参考资料》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着鞭自奋蹄”这是他们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工作的写照。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回忆起来至今仍令人感动不已。《中国财政史》这部教材和《中国财政史参考资料》这套资料也确实开创了中国财政史研究的新局面，可以说没有昨天的《中国财政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财政史》。

这本《中国财政史》在尊重原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吸收了十年来教学实践的经验，遵照财政部培训中心修订中国财政史教材

的指示，对原《中国财政史》作了较大改动。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从内容上，本着“厚今薄古”的精神，对古代部分进行了压缩，加强了近现代部分，增加了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广州革命政府和武汉革命政府财政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财政两编。

从结构上，这本《中国财政史》按照社会形态分为五篇，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篇下分章，章下根据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不完全按收、支、管设节，而是按政策、制度设节。

从范围上，上限从财政萌芽写起，下限一直延伸到 1995 年，从而使这部教材成为了贯穿古今的专业通史，迄今为止尚无如此完整的中国财政史问世。

这本《中国财政史》是对原版《中国财政史》的一次改革尝试，至于这次改革是否成功，有待实践的检验。

由于我们知识水平有限，加之篇幅的限制，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修改、补充，不断提高本书的质量。

第一编 中国奴隶制社会及向封建 社会过渡时期的国家财政

第一章 中国财政范畴的产生

我国的财政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出现的？探讨这个问题对研究财政的本质、职能等理论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财政史这门学科首先要涉及的问题。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要准确地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里，只能根据考古材料、古代文献的零星记载和历史传说，加以说明。

第一节 部落联盟中的财政萌芽

我国历史的第一章如果从元谋人（现今发现的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因其化石出土于云南省元谋县一带而得名）写起，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万年了。在这漫长的历史年代中，原始人群时期占去了绝大部分，大约在五万年以前，我国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为我们画出了母系氏族繁盛时期的图景：当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稻谷、粟之类禾本科植物，以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当时的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如石刀、石斧、石

镑、石凿等 还有精制的骨器 如骨制鱼钩、鱼叉等 也有木器和相当数量的打制石器；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为主，并彩绘之以几何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农氏似与仰韶文化相吻合。

《白虎通》说：“于是 神农因天之时 分地之利 制耒耜 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⑤“神农耕而作陶”。这个时期的政治是：“刑政不用而治 甲兵不起而王”；“无制令而民从”；“……天下为公……是为大同”；“古者……则天下为一家 而无私耕私织 共寒其寒 共饥其饥”^⑤。这个时期的经济比原始人群时期大有发展，但显然还没有剩余产品，氏族内部的一切生产资料都归氏族成员所共有，一切活动都按传统习惯行事，人与人之间贫富与共，平等相待。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不会有财政这个范畴的产生。

大约五千年以前，我国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公元前 2800 年前后的龙山文化遗存（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邱龙山镇而得名），绘出了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图景：这个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 但畜牧业已大大发展 出现了农、牧分工的迹象 生产工具则有精制磨制石镰、蚌镰、骨铲等 日用陶器开始用轮制造 并以灰陶为主，这些都比母系氏族大有发展。这个时期的政治，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大为降低以外，墓形大小悬殊，随葬品也多寡不同，这标志着私有财产已经出现，但还看不出社会制度发生多大的变化。

父系氏族发展到中后期，原始氏族社会渐趋瓦解。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是齐家文化（因发现于甘肃和政齐家坪而得名）和大汶口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车站而得名）。这些文化

《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

《商君书·画策》。

《淮南子·汜论训》。

《礼记·礼运》。

《尉繚子·治本第十一》。

遗存表明,当时的经济更加发展。除农业、畜牧业外,手工业已有新的发展。如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细陶器,在这些陶器中,有高柄杯之类的酒器。除陶器外,还有精制的玉器和象牙制品。生产工具除磨制石器、骨器、木器外,还发现了红铜器。从酒具和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当时剩余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剩余已达相当数量。剩余产品的出现给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其中主要变化是贫富之分更加明显。从大汶口墓群的随葬品可以看出,有的墓葬随葬品十分简陋,甚至空无所有;有的墓葬则使用原始的木椁,随葬品有大量的陶器和石、骨器,甚至有精制的玉器和象牙器。前者无疑属于贫困人家,后者很可能是富有家庭。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从大汶口文化遗存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迹象。如大汶口 13号墓,不仅有较丰富的随葬品,而且有 14 个大猪头,这似可以说明家畜已为家族所私有。郭沫若根据考古资料推断:这个时期,土地虽属公有,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个体劳动和家族耕作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因而土地定期分给家族耕作,畜牧、手工业也交由有经验的家族负责。这样,名义上是公有,实质上是私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劳力多少不同,强弱不同,家族生产技术、工具、经验等不同,产量自然不会平均,久之,则贫富不均的现象就出现了。掌握各生产部门的家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努力追求私有财产的增值,致使私有观念越来越重,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我国历史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与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时期较为相当。《韩非·难一》说:“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划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农者侵畔,为的是争土地,渔者争坻,为的是多捕鱼。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私有观念之重。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变革。为了治理水患,防御外族进攻或进攻其他部落,血统性的氏族逐渐组成地域性的部落联

盟 部落联盟的首领由氏族成员公举 主持部落联盟的会议 决定部落联盟的大小事宜。但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都是由富有家族担任的 传说尧、舜都是富有家族 禹的父亲鲧曾筑城保护自己家族的财产。舜的时候 曾对部落联盟进行了重大改革 设置了主管土地、教化 管理人民、山林川泽 掌管祭祀、刑法等的九个官职 官员达 50人 。这样 部落联盟就变成了富有家族的议事机构了。而变成富有家族议事机构的部落联盟首领集团，实际上成为了国家形态的萌芽。

这个时期 战争频繁 传说黄帝三战炎帝于阪泉 擒杀蚩尤于涿 又做了大量的民事 如为舟楫之利 方便交通 造臼杵 以舂米 制弧矢 威慑天下等等 。战争与民事都要消耗大量的财富。在私有观念已经产生并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要取得这批财富 不借助部落联盟议事机构的权威是难以办到的。而借助部落联盟的权威取得大量社会财富的方式 已不属于一般的经济分配范畴了 而属于财政范畴 但因其没有形成体系 因而 我们称之为财政的萌芽。

第二节 我国财政范畴的形成

原始氏族末期，社会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酒具的大量出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标志；畜牧业有了新的发展，家畜中不仅有猪、狗，而且有羊、牛、马等 渔猎已降到辅助地位 手工业有了相应的发展 并从农业、畜牧业中独立出来。从二里头文化遗存中 可以看到铸铜业、制骨业、纺织业、编织业和制陶业的痕迹。交换和贸易也发展起来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贝和绿松石等物，皆非

参见《礼记·明堂位》。

参见《史记·五帝本纪》。

参见《周易·系辞下》。

本地所产，显然是交换贸易得来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私有观念发展成为私有制度，富贫之分判若云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立已经十分鲜明，从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墓葬中，不仅可以看到随葬品的多寡不同，还看到有绑着双手被活埋的迹象，这证明奴隶制度已经出现。

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相对年代，上限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下限早于郑州二里岗期间的商代文化。从出土文物的性质分析，应属于我国传说中的禹夏之时。据我国古代传说，“夏后氏官百”^③，“夏有乱政而禹作刑”，可能禹夏时，奴隶不断暴动，禹制定了刑法以进行约束。还传说，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挑淮泗而注诸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⑤。还传说，禹曾在阳翟筑城设都。

二里头文化遗址与古代传说相印证，足以证明禹夏时我国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这时不仅形成了阶级，而且形成了国家。禹设都城，置百官，作刑律，而且治水工作也颇见成效。这一切都需要耗用大量财富。尽管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绝旨酒”，可谓简省，但所要消耗的财富绝不是禹本人所能解决得了的。那么这笔财富用什么方法取得？无疑要借助国家的政治权利向奴隶和贫民索取。二里头遗址中部的宏伟宫殿建筑，显然是大量被奴役者的血汗与智慧凝结而成的。传说禹征三苗，那么当时的武器、食品之类，无疑也需要占用奴隶的剩余产品，占用贫民的财富和人力。这样一

参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5)。

同上。

《礼记·明堂位》。

《左传·昭公六年》。

⑤ 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论语·泰伯》。

《战国策·魏策》。

种新的财产分配关系，即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向被奴役者强制取得财富和人力的财产分配关系，便从一般的经济分配关系中独立出来了，成为了一种新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凭借国家的政治权力强制取得社会财富的新的分配关系，我们称之为财政。

关于财政方面的历史传说，在夏以前未见史载，只是到了夏代才逐渐产生并不断增多。诸如《尚书·夏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贡已属财政范畴。《史记·禹本记》载：“众土交正，致慎财富，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左传·襄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些诸侯向禹进献贡品的传说，都是有关财政方面的。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的财政范畴产生于夏代，而最早的财政范畴是贡与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期以前，由于经济不发达，阶级和国家都没有形成，这时只有一般的经济分配关系，没有财政分配关系，因为没有剩余产品，所以这种经济分配关系不过是饥饿的分配，充其量是对老者和幼者多一些关照而已。父系氏族后期，生产力有所发展，社会产品有了剩余，这时的经济分配关系已不再是饥饿的分配，而是由谁占有剩余产品的问题，这时私有制的萌芽出现了，并且出现了贫与富的两极分化，于是阶级的萌芽出现了，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富有阶级的利益，于是保护私有财产和富有阶级利益的国家的萌芽就应运而生了，随着国家萌芽的产生，为了实现国家的职能，国家的经济支柱——财政也随之萌芽了；夏禹之时，社会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多，阶级的对立日益严重，国家的职能日益扩大，财政这种分配关系也日益明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财政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并与国家发生着直接联系。换言之，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而夏禹时的贡与赋则是我国最早的财政现象。正如《史记》所说：

“自虞、夏时 贡赋备矣。”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财政产生伊始就满足了国家的下列一些职能的需要：

首先，满足了国家行政职能的需要。其中包括：

1. 行政官员及行政机构的物资需要。《礼记》载：“有虞氏官五十 夏氏官百 殷二百 周三百。”这里的官是官的职位，一个职位可能有几个或十几个官员。虽然国家不直接给以俸秩，但需分封土地和奴隶 相当于给棒秩 还有官署的费用 合计在一起 需要国家分配的土地和奴隶的数量就十分可观了，而将土地分配给这些官员，就减少了国家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于减少了国家的收入。

2. 军队、监狱等专政人员及机构的物资需要。当时各国之间的战争十分频繁，其目的无非是争夺土地和奴隶。关于天子及各诸侯养兵的传说史书多有记载，仅从殷墟发掘出来的材料就足以证明当时养兵费用的浩繁。当时的军队已分为车兵、步兵等兵种，而且有左、中、右师的编制 在墓葬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戈、矛、盔、冑等武器装备。这些军队不仅对外进行战争，对内还执行镇压奴隶暴动、抓捕盗贼等差事，同时还有刑罚、有监狱。这都耗费大量物资。

3. 天子的生活需要和建筑城墙、宫室、宗庙等的需要。这项需要是十分庞大的 据《竹书纪年》载：“夏启元年 帝即位于夏邑 飨诸侯于钧台。”为了强化宗法观念 表示君权神授 统治者以大量的财力去建筑庙宇以及大搞祭天地、祭祖先、祭鬼神、祭山川等的祭祀活动 因而祭祀与葬礼的耗费是当时的大宗支出。《左传》说：“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可见这种迷信活动的耗费有多么浩大 竟与军队的耗费相提并论。

其次，满足了国家公益性需要。当时大型的公益性需要就是治理水患、修建道路等。尧舜禹汤治理水患的传说，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而大禹治水的故事，已不是传说，而是经过考证了的历史事实。

再次，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当时有为数甚多的官营手工业，如制陶、制铜、制骨、纺织等手工业。这些手工业不是为奴隶和平民设立的，而是为统治阶级设立的，但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财政

第一节 夏商西周时期财政的特征

夏、商、西周三代的经济部门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奴隶制国家对土地享有独占和控制权，并对奴隶、平民进行劳役剥削，将其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大部分集中起来，用以满足国家职能和奴隶主阶级生活的需要。是这一时期国家财政的基本特征。具体说有以下几点：

一、土地王有

在原始社会中土地是公有的。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土地演变为王田制。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田字写作田、目、目等形状。从字形来看，很像是阡陌、沟洫，把土地分成了若干整齐的方块，其中有四、六、八或九块不等。文字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种象形字反映出当时的土地正是由这些井字形的方块田所组成的，每块田代表着一定的土地面积。同时，方块田之间的阡陌、沟洫说明商代的耕地中已有了原始的水利灌溉系统。这些方块田，由商王在各级奴隶主之间，按照亲疏尊卑的等级，连同土地上的奴隶赐给臣下。得到土地的奴隶主可以世袭享用，但不许私自转让或买卖。他们只有土地的享用权，而无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商王的。这种土地分配和管理制度，叫作“井田制”。

西周时期，全国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最高统治者——

阡陌：田地里纵横交错的小道。南北曰阡，东西为陌。